

【文学研究】

论《最蓝的眼睛》中身体破损意象的双重性

张秀见

(长安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托妮·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中通过描绘不同黑人的命运,对白人主流文化冲击下黑人个体的失落和异化问题予以深刻的关注。其主要以身体破损意象为表征,通过对不同人物的分析,阐明了这一意象的双重含义:它既意味着失落和异化,也意味着对失落和异化的反抗。通过反抗,托妮·莫里森提出了黑人个体尤其是黑人女性重建自我身份的主张,即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并打破白人主流文化的神话。

关键词:文学;英美文学;身体破损意象;异化;双重性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7)03-0090-05

Dual implications of the physically broken images in *the bluest eye*

ZHANG Xiu-j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5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rough describing various black people's destinies, Toni Morrison, in her novel *the bluest eye*, pays deep attention to the displacement problem among the black individuals under the invasion of the white mainstream culture. The problem is mainly symbolized by physical broken images. The following passage, through analyzing different figures in the novel, expresses the dual implications of the images: it means not only displacement but also its rebellion. Under rebellion, Toni Morrison puts forth the feasible strategies for the black individual, especially the black woman, to reconstruct their identity, namely, to obtain their discourse power and destroy the white mainstream culture myth.

Key words: literatur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physically broken image; displacement; duality

0 引言

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以下简称莫里森)是迄今为止惟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最蓝的眼睛》是她发表于1970年的处女作。在小说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系列的破损意象:一年四季出现了颠倒,自然之物的生长遭到破坏,国家的上空被战争的阴云笼罩,黑人社区、家庭都已破碎不堪,个体的心理因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蚀而日益分裂等。所有这些意象似乎为我们构建了一个阴暗、抑郁的世

界,但我们不能忽略莫里森的族裔文化身份和写作目的,她的作品继承并超越了传统黑人文学作品对纯粹“黑人性”的描述,并且关注黑人个体如何在失落和异化的境遇中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问题。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主要通过描绘身体破损的意象对此进行阐述。本文通过对这一意象进行分析,论述其双重性特征,即有的意味着失落和异化,有的却意味着对失落和异化力量的反抗。前者是以小说主人公佩科拉的父母波琳和乔利为代表;而后者则是以黑人小女孩克劳蒂亚为代表。

收稿日期:2007-03-09

作者简介:张秀见(1973-),男,山东威海人,讲师。

1 意味着失落和异化的身体破损

从社会文化意义的视角看,美国黑人更容易受到失落和异化问题的困扰。自登上美洲大陆的第二天起,他们就被系统地剥夺了与故乡的文化联系。奴隶制废除后,随着移民浪潮从南方来到北方的黑人依然面临着同样的处境,即他们依然是一群陌生人。“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说,尽管他需要进入所接近的群体的文化模式,但他的生活历史处于这个群体的过去之外,很难对这种文化模式保持一种‘想当然’的自然态度,倒是他的‘家群体’是他个体的生命要素,并始终构成他的自然态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因此,如果当“家群体”也遭到破坏或不能提供有效帮助时,个体就很容易失去自我的文化身份,失去自我的主体性,从而被异化。

让我们首先看一下波琳。自童年起,她就由于腿部残疾而被隔离在群体之外,她错过了象征创造力的“染料和蜡笔”^{[2]87}也产生了一种“宁静和私下的快乐”^{[2]86}。这种快乐主要体现在她嗜好将杂乱无章的物品排列整齐的习惯上,这种重复而简单地排列实际是她内心毫无创造力的外延表现。同时,与集体的隔离培养了童年的波琳一种以别人的眼光和评价来界定自己身份的习惯。而与乔利邂逅时,波琳联想到草莓的种种“颜色”,这种联想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波琳的主体性,因为她能以女性特有的语言即“颜色”来表达自己在男欢女爱中的感受,从而打破了传统白人男性作品和黑人男性作品中黑人女性集体失语的状态。波琳的这种主体身份是建立在与乔利性结合的基础上,是依赖对方而存在的,其实质是身体破损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此这是一种虚假的主体身份,是一种“坏的信仰”。“在我们的时代里,性常常被用来服务于安全;性伙伴使人产生的兴奋不仅是对神经紧张的发泄,而且也可以证实人们自己的存在意义”^{[3]42}。这种需要通过他人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主体性就是被异化的一种表现。

波琳对“颜色”的极度依赖很容易造成她与大自然和谐关系的破裂,这也是被异化的一种表现。因为“颜色”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抽象概括,表示一种恒定的状态,这极易令人忽略大自然的瞬息万变以及风起云涌的创造力量。在黑人传统文化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通过这种和谐关系,人们得以从日常存在中把握现实,从而形成万物有序的整体观念,进而从这种整体观念中获得集体的力量和道德的自信。个体过度依赖“颜色”就无法“正视大自然

力量的广阔并创造性地把自己和大自然联系起来,从而无法使自然和自我的力量都得到相应的发展”^[4]。至此,身体的破损意味着波琳领略到的只能是破损的大自然,等待她的也只能是一种异化状态。

相比较而言,乔利的异化过程比波琳更为复杂、更令人同情。莫里森对乔利的刻画展示了她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思想,这与白人主流女性主义思想有着很大区别:白人女性主义理论的起源是反抗以男性为中心的夫权主义社会体系,以获得原本属于她们自己的福利与权力;而对黑人女性而言,从一开始她们就与黑人男性结成了一种合作的、同志般的关系。莫里森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了她对黑人男性的重视,以及把黑人男性排除在黑人女性之外的忧虑。在一次采访中她对莱斯特说:“我们认为黑人女性是呆在屋里的女人,其实不然,大多数黑人女性与男性一道在田间劳作,奴隶主要求她们与男性做同样的工作。所以说黑人男女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还不如说是同志之间的关系”^[5]。鉴于此,莫里森运用了一种客观、同情的口吻描述了乔利的异化过程。这是以2个身体破损的意象为表征。

第一,黑人女孩达琳身体的破损。在吉米姑妈的葬礼后,乔利与黑人女孩达琳做爱时被白人撞见,这种极度羞辱的经历使他的性格发生了重大转变:白人的过于强大使他不得不将对白人的憎恨转嫁到达琳身上。这种对黑人女性的憎恨代表了大多数黑人男性的历史创伤和扭曲心理的现实。他们视黑人女性为“替罪羊”,正如开尔文·赫顿所说:“黑人男性在自己是压迫的受害者的同时,又用同样的压迫去迫害自己的女性”^[6]。白人羞辱造成的巨大精神缺失激发了乔利寻找父亲的愿望,但遭到了父亲的拒绝。无助的乔利想到了吉米姑妈的爱:“怀着一种几乎撕裂他的渴望,乔利想起了她从盘子里给他递一块熏肉,想起了她用三个手指给他拿肉的样子,尽管有点笨拙,但却充满了爱意”^{[7]125}。以后的乔利很少得到关爱,这些微弱的爱的火花与一直存在的恨之间的矛盾使乔利日益滑向被异化的深渊。

第二,他的女儿佩科拉身体的破损。遭到母亲遗弃、白人羞辱、父亲拒绝后的乔利已无法将自己的经历和体验联成一个整体。“乔利生活的点点滴滴只能在音乐家的头脑中才能连在一起”^{[2]125}。已经一无所有的乔利表面上看来已获得“真正的自由”^{[7]126},此时乔利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可以想走就走,想留就留,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但隐藏在

内心深处的爱又使他的自由成为“危险的自由”^{[2]125}，这种自由类似于那些在奴隶制被废除后黑人男性获得的自由。他们获得自由后，仍无法摆脱过去作为奴隶抚养者的身份，不得不采用各种手段(如流浪)以摆脱这个恶梦，并因此而拒绝承担父亲的责任与义务。这是由于白人主流文化一方面塑造了理想的父亲形象，使黑人女性内化理想的父亲形象；另一方面却不给黑人男性就业的机会，这就从经济的角度根除了黑人男性成为这种形象的一切可能性。哲达·勒纳说过：“最底层的社会地位、报酬最低的工作总是为黑人女性保留的。通常情况下，即使黑人男性在失业时，黑人女性也能找到工作。所以，可以确定地说，白人社会从经济上让黑人女性对抗黑人男性”^[7]。这样黑人男性就被剥夺了传统意义上的“阳刚之气”，这无疑加重了黑人男女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由爱和恨形成冲突的自由使乔利无法整合自己的经历与体验，从而失去了自己的存在感。所谓存在感“就是人对自己存在的体验，它可以使人的各种经验得到整合，把人的存在联结为一个整体^[8]，而这恰恰是个体不致失落和不被异化的标准。面对失业的乔利，波琳“极端需要他的罪过”来使自己成为上帝一样的角色，并教育子女“不要像他们的父亲那样”^{[3]100}。这样乔利最终以酒精作为逃避的手段。当乔利“失去了以成熟的爱的方式与别人建立联系的能力”^{[3]22}，并最终怀着一种矛盾(爱与恨)的心情强奸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佩科拉时，他就完成了自己的异化过程。

2 意味着对失落和异化力量反抗的身体破损

莫里森在《在黑暗中玩乐》一书中写道：“绝大多数移民在去美洲之前在本国都要受到政治的、宗教的或者经济等多方面的压迫，尽管他们也曾试图把种种恐惧遗忘在旧大陆，但这种恐惧一直阴魂不散。为了摆脱这种恐惧，他们就把它转移到黑人身上，从而让黑人成为他们的替罪羊”^{[3]222}。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白人主流社会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从限制黑人的身体和精神自由到从文化上进行侵蚀——使黑人走向边缘化和异化。面对这种情况，黑人个体应如何应对？如何保持自我文化身份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作品中，莫里森以黑人女性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力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即黑人女孩克劳蒂亚的经历。这种探索是以洋娃娃身体的破损为象征的。

与佩科拉破损的家庭不同，作品主要叙述者克劳蒂亚一家要稳定、安全得多。其父母麦克蒂尔夫妇既表现了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又保持了黑人文化传统。在黑人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克劳蒂亚得以形成比较健康的人格和心理。不可否认的是，克劳蒂亚也处在一种被异化的边缘，并且在2种文化之间挣扎徘徊。如克劳蒂亚在为佩科拉的婴儿祈祷健康时，把野菊花的种子和美元同时埋在地下。用种子的发芽和成长象征婴儿的成长，这与黑人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相暗合；但美元则象征了美国本土的消费主义。2种文化的同时出现和不相容性，既预示了佩科拉新生婴儿的死亡，又预示了文化认同的不现实性。但是，面对几乎同样的处境，克劳蒂亚不像其他黑人只是“适应而不提高”^{[3]16}，她不允许自己处在被“注视”之下，而把自我完全交给主流的审美标准来定义；相反，她采取一种抗拒态度。圣诞节时，克劳蒂亚收到一份礼物——白人洋娃娃，但她对这份礼物一点也不喜欢，反而有点儿害怕。因为这个被公认为美丽的洋娃娃就外表看与她自己没有任何相同或相似之处，对洋娃娃的肯定无疑就意味着对自己的否定。既恐慌又迷惑的克劳蒂亚产生了把洋娃娃拆开看个究竟的念头。此处的洋娃娃正体现了白人主流文化的审美标准，所以它的身体破损蕴含了双重含义。

2.1 对话语权的渴望

对于以克劳蒂亚为代表的黑人女性来说，把洋娃娃拆散寻找她的发声奥秘意味着对话语权的渴望，即对权力的渴望。福柯曾经说：“权力产生知识，权力和知识正好是互相蕴涵的；如果没有相关联系的知识领域的建立，就没有权力关系，而任何知识都同时预设和构成了权力关系”^[9]。这种“知识即权力”的论断无疑为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现实的处境提供了最恰当的注脚。由于主流社会所创造的知识占有绝对压倒一切的地位，所以黑人女性所创造的知识常常被认为是非客观的，不被当作知识来认知，从而令她们失去了话语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美国黑人女性在传统的白人主流文学中一直处于被类型化的状态。传统美国庄园文学作品主要塑造了2种黑人女性形象：一种是所谓“庄园老妈妈”的形象，这主要出现在南方作家的作品中。她们都具有深黑的肤色、肥胖而十分强壮的身体、和蔼的态度、信仰宗教且擅长养育(这里指养育白人的孩子)。另一种是悲剧式的混血儿形象。尽管她们具

有2个种族的特征,但意味着黑人作为被物化的民族面对白人的价值观时所进行的抗争;因为是非法所生,意味着她们要承受身份危机带来的折磨。这种种打上白人文化烙印的形象就作为一种标准强加给黑人女性,以此控制她们的行为举止,从而成功地压抑她们的反抗精神和创造力。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反向歧视”,即通过对黑人女性特征和功能的类型化,把她们局限在一个特定领域,从而制约她们的发展。这实际就是重塑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自我”,黑人女性因不得不与这个不存在的“自我”时时抗争而极易造成性格上的分裂。

第二,在白人主流女性主义理论中,黑人女性也处于一种客体性的地位。许多黑人女性作家和评论家都承认:绝大多数文学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其心理刻画都是以白人中上层阶级女性为基础的,根本没有考虑黑人女性在种族和性别压迫下的独特心理。而且,许多黑人女性还认为白人女性主义者在构建自己的理论时,自己只是被利用的牺牲品而已。因为白人女性主义者认为,黑人女性不是忙于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就是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太深而无法代表女性主义运动的全部,这种看法无疑会忽略和压抑黑人女性的个性。她们还认为女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大家都以不同的形式遭受男性的欺压,因此旨在争取平等权利的妇女运动在为白人妇女争取的同时,也为所有的妇女谋取福利。这意味着它的关注点开始从解放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女性转移到纯粹的女性运动中去,这样就使黑人女性处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上:黑人女性不得不在2个虚假的选择中进行选择,要么为黑人运动而呐喊,要么为白人女性主义服务。但对黑人女性来说,她们更需要首先解决的是经济困难和种族歧视,而不是急欲像白人女性主义者那样在夫权社会中获取平等的地位和权利。

第三,在传统黑人男性作家的创作中,黑人女性也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在理查德·赖特和拉尔夫·艾里森等作家的笔下,黑人男主人公已经从幕后走向了前台,但他们作品中的女性却一直是作为陪衬物而被扭曲地刻画着,如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中,蓓西的母亲和比格的母亲,前者酗酒成性,后者则老态龙钟,只知一味地忍耐;又如拉尔夫·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中,西尔认为,要谈论女性的权利,首先就得考虑女性的需要,而这种需要是以满足男人为基础的,否则人生就毫无乐趣可言。莫里森对此曾表达了深刻的关注,在一次访谈中,莫里森曾

对查尔斯·鲁亚斯说:“拉尔夫·艾里森、理查德·赖特的作品的确令人佩服,可就是感觉不到他们究竟给了我什么”^[10]。

鉴于此,对于黑人女性来说,要想获得权利首先就要获得话语权,而黑人女性作家只有通过写作来构建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形成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从而体现黑人女性的话语权。莫里森对于克劳蒂亚拆散洋娃娃的举动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2.2 打破主流文化的神话

洋娃娃身体的破损还揭示了白人主流文化也是被建构的这一特点。它既然是被建构的,那么就存在被打破的可能,即存在文化多元化的可能。

克劳蒂亚通过拆洋娃娃不但发现了它的发声奥秘,而且还弄清了它的结构,它只不过是由一些人造物品组成,一旦被拆散就毫无秘密可言。这暗示着它所代表的主流审美标准也是人为的,并非与生俱来,其合法、合理的外衣是通过主流社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尤其是通过教育对少数民族包括黑人民族进行灌输而获得的,小说开头的小学生读本就是主流社会对黑人进行教育的一种体现。在随后的章节中,莫里森从各个角度描述不同人物的命运,展示了黑人个体和群体在这种错误教育中的凄惨命运,佩科拉的经历不用细说,杰拉尔丁是这种教育的牺牲品,就连克劳蒂亚最终也承认:“我们对死亡的追求目的是自认为自己勇敢,并且像贼一样从生活中隐匿;我们用准确的语法取代知识;我们改变习惯假装成熟;我们重新编排谎言,并称之为真理”^{[2]159}。主流社会所灌输的观念造成许多黑人的“无知”,而这种对社会现实具有建构性特点的“无知”并没有激发他们的反抗之心,而是使他们内化这种“无知”,转而怨恨自己。“这种无知”是“平静的培养起来”,并且“自我憎恨”是“用心的习得”^{[2]355}。雷蒙德·威廉指出:尽管霸权文化是“一个由各种实践和期望构成的整体,而且在这个整体中,一切已存的运作过程几乎都是由特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义和价值观所控制,但它从不是铁板一块”^{[1]36}。更何况这种建构本身就是人为的,即完全存在被打破的可能性。克劳蒂亚拆散洋娃娃的行为就是一种主动打破建构的行为,同时还伴随着新的自我意识的形成,这是一种积极的抗争。“你若要获得自我,你就要打破幻想,打破神话,把头上的白色洗掉,在斗争和探知真相的过程中承担自己的责任”^{[1]36}。正因为如此,克劳蒂亚才能免于外在身份定义的威胁,才能以健康的心态回忆佩科拉的悲惨经历,并且在客观分析她受到主

流文化侵蚀的同时,勇敢地指出黑人社区中“恶”的一面——把佩科拉当作替罪羊来洗刷自己的不幸,这中间也包括她自己。

由此看来,克劳蒂亚拆散洋娃娃的行为意义深刻,不但对白人女性主义排除黑人女性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而且有力地弥补了白人女性主义理论的缺陷,从更深层次上拓展了女性主义的理论范畴。

3 结 语

鉴于美国黑人文学在经历了从描述到抗议、从激进到内省、从倡导黑人民族性到关注人类共同命运这一逐步成熟的阶段,因此发表于1970年的《最蓝的眼睛》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上接第82页)

对于把握文艺学的身份嬗变,在新的语境下重建文艺学的学科身份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无论是本质主义的重建思路,还是反本质主义的重建思路,都不难发现其中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显示出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学术鸿沟和理论偏执。这两者的优势和劣势是显而易见的,却也是难以克服的。因此,要真正重建文艺学的学科身份,必须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包容西方文化理论中适合中国学科现状的合理因素,尤其是当代西方地方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只有这样,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才能走出本质论争的狭隘视野,解决文艺学研究和实践中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Jonathan Friedm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 [2] 陶家俊.文化身份的嬗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3] 罗蒂.后哲学文化[M].黄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 [4] 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 [5] 程革.走向对话和开放的文学研究[J].文学评论,2006,51(3):203-205.

- [2] Toni Morrison. The bluest eye[M].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70.
- [3] Rollo M. Psychology and the human dilemma[M]. New York: Norton Press 1967.
- [4] 杨韶刚.寻找存在的真谛——罗洛·梅的存在主义心理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5] Nancy J P, Toni Morrison.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P, 1987.
- [6] Wilfred D S. Toni Morrison[M].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9.
- [7] Gerda L. Black women in white America[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P, 1981.
- [8] Rollo M. Love and will[M]. New York: Norton Press 1969.
- [9] 李银河.福柯与性[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 [10] 王守仁.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美国二十世纪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1] Gurleen G. Circles of sorrow, lines of structure[M]. Shreveport: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6] 张杰.高新技术时代经典艺术的命运[J].社会科学辑刊,2003,29(3):154-161.
- [7] 和磊.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J].文艺研究,2005,22(9):155-157.
- [8] 盖生.文学的文化研究退潮与经典化文艺学重建的可能[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22(4):130-137.
- [9] 周小仪.西方文化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 [10] 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11] Jacques Derrida. This strange institution called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Jacques Derrida[M].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2.
- [12] 陶东风.文学的祛魅[J].文艺争鸣:理论评论版,2006,22(1):6-22.
- [13] 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蒋子华,张萍,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 [14] 董馨.论“文学性”的意识形态功能[J].东岳论坛,2005,26(3):120-122.
- [15] 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J].文学评论,1998,51(5):77-88.
- [16] 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17] 钱中文.正视中国文学理论的危机[J].社会科学,2006,39(1):95-98.